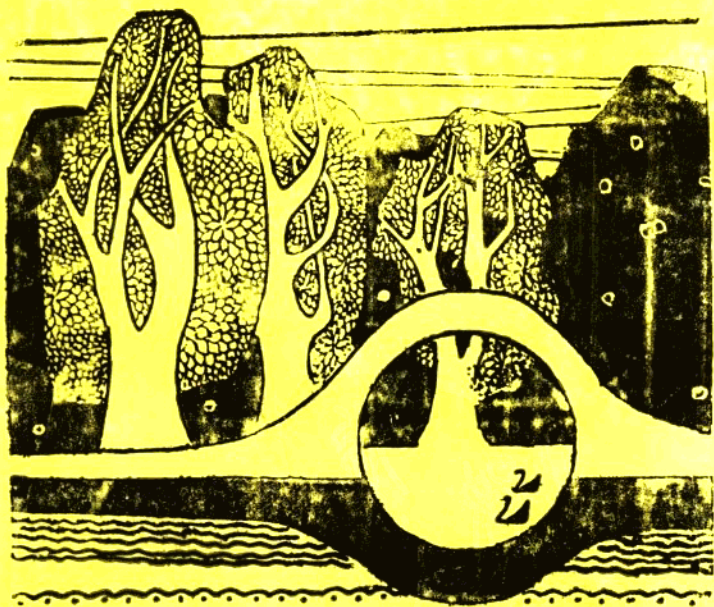


文 旅 博 覽

南 絲 古 道 行 (上)

王 景 瑜



目

录

自序.....	1
古道概述.....	3
丝路起点.....	17
草堂风韵.....	19
成都花会.....	22
游武侯祠.....	27
人民公园.....	31
望丛增辉.....	34
青城探幽.....	39
赋万里桥.....	46
嘉州漫笔.....	48
自贡情思.....	53
宜宾纪胜.....	64
首站双流.....	70
新津揽胜.....	71
重镇临邛.....	72
芦山面目.....	75
名山胜景.....	76
雅安之旅.....	77
国粹“高颐阙”.....	83
荣经风流.....	86

“宝藏兴焉”	88
漫话汉源	89
石棉峥嵘	92
古隘甘洛	96
古驿喜德	98
越西钩沉	100
冕宁撷粹	102
西昌山水间	104
凤凰城	115
古城会理	116
米易情缘	121
农苑奇葩	130
迷阳景胜	135
八景溯源	135
龙肘风流	140
孙水断想	147
海塔揽胜	150
令昔“清真”	156
观音寺	161
“神水”温泉	165
芭蕉菁水库	167
龙塘溶洞	171
边城华物	175
甘塘古茶	175
蛇園撷趣	177
“虫会”拾遗	179

绞股兰考	187
兰族史诗	191
“中华绿”	196
安宁参	201
贵妃贡米	202
蔗糖漫话	204
文化走廊	210
文史絮语	210
邛崃野录	218
米易碑廊	227
廉政碑	228
土千户功德碑	229
附《从“安氏碑”的发现经过所想到的》	231
对米易护林石碣的思考	234
何东铭墓志铭(碑)	235
仙人碑	237
平蛮王碑	237
“迷阳山馆”碑	237
《挂榜大村清真寺碑文》暨“按注”	237
马进士族系碑群	238
傩傩撷萃	240
彝俗长廊	268
挂榜之战	279
迷阳辨析	282
“药王”会辨析	283

北方丝绸之路，那茫茫戈壁、漫漫黄沙、驼铃声声的音容，早已在我的脑际里先入为主。这是我幼而学、壮而问之故。这条路是由成都至西宁，沿青海西北，柴达木至楼兰与新疆南路相接，而至西域；其河西路是由成都经长安，至陇河西走廊，跨帕米尔高原而至西域各国。可谓西出青海，北接秦凤，全称为西北丝绸之路。1958年和1965年，我两下西昌，分别在会理、米易两地安家落户。因此我的大半生都在这蜀身毒道北段东西两线的重镇辗转往复，多是薄见寡闻，且浅尝辄止，常是有感无获。至八十年代初，我初猎涉文史，渐渐扩视增知，始悉南丝古道曾经二千四百多年的悠悠岁月，是不远万里的漫漫长途。从此我的主观思路与客观上的丝路，亦复水乳交融，将其发展沧桑的述闻串连起来，兴味欣然。其间我博采众说，敬同尊异地品味、尝析沿途的拾零、撷弃、揽絮，先后曾写出一些随笔、散文、方輿考证、史海钩沉及相关的诗、词、赋、曲、歌，分别刊于京、沪、豫、滇、黔等省的全国、省市书、报、刊上。

这条从成都经云南高原，越过缅甸通往印、孟、巴而抵中亚，直达欧洲的古道。因其出进口大宗商贸物资，象征丝绕一般，故又称丝路。自古以来，一直以其魅力，吸引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文人、学者和商贾。诸如：忍季父率部迁徙，先秦庄蹻的南行拓疆，司马相如的西南夷置郡风韵，司马迁西征撰鸿篇，诸葛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动人传奇，赵匡胤“玉斧划界”的雄魄，忽必烈革囊竞渡的征缅赫功，杨升州庵流放边陲的谪文壮咏，石达开西征的羽檄英姿，《徐霞客游记》对古道山川景物的描绘，洋人马可波罗对古道民俗风情的深刻感受，

滇西人民抗日悲壮节烈史迹的实录，艾芜《南行纪》对古道各类人物的生动刻画，以及在此道流通的邛竹蜀布、摆童笮马、怪禽异兽、奇瓷珍宝、海贝贖物、金银盐茶等。凡此不知此道留下了多少先人的英雄足迹，曾有多少雄关、驿站的冲天烽火，曾有多少商贾出奸在高山、深涧、密林、长河，曾有多少民族商品文化的异彩纷呈及其生存竞争的兴衰。它历尽了人事坎坷的苦涩和世间的悲欢离合，开创了震撼西、南、中亚乃至欧洲的壮举。这些都足以表明这条神秘的南丝古道，从公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不仅为历朝历代作过军政奉献，而且把川丝蜀锦及其精湛技艺传至西、南亚，促进了中印贸易和文化交流，在我国文明史上写下了绚烂的篇章。

本人由于根据被马克思誉为印度《伊利亚特》的古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术》的记载以及一些有关史料，使我对古道的亘古存在坚信无疑。我在这条古道上，乘考察、参会、旅游、走亲访友之便，或走（下）马观花，或访谈今昔，或拾零集絮搜撰述闻，先后写下并积累一擦擦断忆、感受、笔录、笔记，一直爱不忍释。尤其参加政协川西南片区文史资料协作会每年轮流坐桩的年会，古道逢转，资料犹丰，于是构想和策划编撰《文旅博览·古道行》上、下集。但据悉出书要购书号等费用，还要自负发行。我想起兜售脑力劳动产品那副可怜兮兮尴尬样子，就兴味索然。在商品大潮中，以自己的清水汇集几许清水，用平时积下的稿酬加上为公私纂写方志与家谱所得润笔费和赞助，将其以内部书刊付梓版行（已出版《咏释》）。这主要是用于抛砖引玉和进行弘扬中华文化交流，以文会友，弥补蹉跎。但自知笔拙智薄，浅淡翰墨，且日久旷废荒疏，谬误之处难免，乃望教正，不胜感激之至。

古道概述

1954年春,笔者就寓居南丝古道起点十余年;1958年2月“一下西昌”和1965年12月“二下西昌”迄今辗转古道数十余次。古道述闻、文史拾零丰矣,加之情见乎辞,博览旅萃,尤际鼎盛时遇,藉藉荣荣亢奋喜悦,纂志成集,聊尽绵薄。

自1986年前,四川大学教授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郝瑞以及攀枝花市文管处的行家对西南丝绸之路进行了综合性的科学考察,参照川滇有关专家的考证资料,证实了我国西南一直存在着一条自成都出发经川西南至云南,连接中亚、南亚、西亚而达欧洲的古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如能进一步考察并论证西南丝绸之路的有关史实和相关现状,去追访古人的遗迹,寻溯前辈的开拓的业绩,古镜今鉴,不仅具有重要的“存史、资治、教化”的社会历史学术意义,而且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制定西南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开发建设大西南实践,都有着一定的现实的意义。

我们平时所说的丝绸之路,自然联想到茫茫戈壁、漫漫黄沙、驼铃声声的起于公元前2世纪前横贯中亚的北方丝绸之路。它起于渭水流域,经河西走廊至新疆,起葱岭赴大宛(中亚阿兹别克地域),经康居(撒尔马罕地域)至木鹿城和槁城(今里海达姆干地区)诸地,再抵地中海东岸而辗转至希腊、罗马等地。然而,这条西南丝绸之路一直鲜为人知,它要比北方丝绸之路早两个多世纪,它取道西南,由成都出发,通过云南到达缅甸,再从那里联接西亚、欧洲和非洲。史实证明南方商贸古道通过商品文化进行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文明因之外播,而身毒(印度)、大夏各国文明也因之传入。四川乐山麻浩、柿子湾东汉崖墓的三尊石刻佛象及彭山江口崖墓出土的陶佛象树座,建造年代早于中原诸地,可知佛教由西南丝路传入早于西北丝路。再如抗日时期所修筑的川滇公路、滇缅公路与西南丝路的走向大体一致,有的地段几乎接近重合。1990年秋,古道成昆等14个地、市、州的文博单位联合举办了“西南丝绸之路文物摄影艺术展”,展出有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遗址和远古石、骨、陶、铜器以及各个时期的雕塑、建筑、墓葬器物、图片等。这些古文物的展出,将有利于推动、促进和加强对西南丝绸之路的考证和研究。还有1989年元旦节,随着昆明成立了缅甸校友会。200多位缅甸归侨暨全体校友共同议定校友会宗旨是:充分利用各自与海外亲友的关系,广泛团结缅甸校友,积极开展国内外及港澳台校友的联谊活动。誓为“重

开古南丝绸之路”而努力。1991年3月份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南方丝绸之路,展示了古道美丽的山川风物和绚丽多姿的祖国大家庭的民族风情。

贾耽有《入四夷述》中记有从交州经大理至印度迦摩缕波和揭陀国的详细路程。《蛮书》中记有成都至大理路程,论证了这条丝道的走向,即从成都(汉蜀郡)出发,经云南、缅甸至印巴次大陆,进而至欧洲。

其中川滇路有两条:第一条是历史上的习惯路线,史称“古旄牛道”(又称西夷道、灵关道、越嶲道、蜀身毒道、西洱天竺道、清溪道、会同路、姚嵩路、南路、占路)。“自成都至阳苴苴城(大理)道路”即南丝路北段西路(四川境内的西段),发在成都,经双流、新津、邛崃、芦山、名山、而至雅州(雅安),经荣经翻大相岭,南渡大渡河,历汉源清溪关、再经石棉、甘洛、越西至冕宁、西昌、德昌等地,到达会理县境内的迷易(今属攀枝花市)以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市渡金沙江至云南永仁、大姚、姚安而至大理。史称此道“自唐迄清,千余年来,具遵此路”。另一条是南丝路的北段东线(四川境内东段),它的起点出自成都,通过陆路或水路以武阳(彭山)沿江而下,经眉山、乐山、犍为至宜宾(汉称僰道),渡金沙江后沿横江河谷而上,再沿这条秦时“五尺道”(隋唐“石门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盐津、豆沙关、大关、昭道(汉称朱提),曲靖、昆明、安宁、楚雄、南华而至大理。

以上两途会于大理,继续向西延伸,就是永昌道,沿滇缅公路、经永平、宝山、腾冲,循大盈江南行,过干崖到缅甸境伊洛瓦底江口上游的八莫,再西行至印度,从那里再通过海路或陆路转至西亚、中亚和东南亚,或以大秦道相接而至欧、非等地。

南丝古道是“蜀身毒道”经济文化交通干线的代名词。中国尤其四川丝绸驰名,公元前四世纪起,此道即通。此道在远古时有一条西山南道和先秦时的青衣道。两道在后来都与川境的北段西线大体重合。史书记载古道“除了布匹、竹杖外,别的货物也通过云南和阿萨密的森林山区”。据法国汉学家伯希的考证,印度古代梵文经典《摩阿婆罗多》和《摩奴法典》中“支那”一名乃是秦的译音,“印度人开始知道中国。”

我们考证过程中,既博采资料,又广集口碑,由此探索古道的蛛丝马迹,就可联系类比、分析、推断,形成书面资料,积累历史遗存。比如据米中退休教师孙正权等同志口碑:古道北段西路官道南段,还有北段西路民道西段,即在当年的邛崃(今攀西)地区还有两条支线:一是从西昌不走以南,而走以西,经德昌、盐源,

而入云南的宁蒗、丽江等地而入缅(迄今盐源与宁蒗接壤的泸沽湖,留有元军蒙族后裔,可证此路早存)。二是从今攀枝花市,不走以南,而走以西,经华坪、永北(原叫永胜),到丽江等地入缅。以上攀西西段两道民间商道捷径,西昌、攀枝花市口碑者皆谓长辈经商多从此道往返。

《华阳国志》等史书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汉以来由越嶲郡入滇道路有东路“堂狼道”、中路“青蛉道”、西路“摩沙夷道”。会无即今会理,范围广及今会理北部会东、宁南等县及攀枝花市的米易和仁和区的安宁河、雅砻江以东地区。其路出会理向东,经会东渡金沙江而至云南会泽、巧家地区,即汉堂狼县地,与“南夷道”合,今仍有轮渡联接川滇。该路实际上是“西夷道”与“南夷道”在中途的一条联接线。西路“摩沙夷道”曰“定笮……渡泸、宾刚缴,曰摩沙夷。”定笮设治盐源,初辖四川盐源及云南华坪东北部分。此路从西昌向西南、渡雅砻江、翻磨盘山、小高山后而至盐源。再由盐源向南、经盐边(汉大笮)西部而至华坪、永胜一带(汉姑复)。由此向西渡金沙江后可至丽江;向南也需渡江顺宾川盆地直达大理。至于“蜻蛉道”乃夷西道的主干道。《华阳国志》载:“三缝县(后讹为三绛县),一曰小会无……通道宁州,渡泸得蜻蛉县。”三缝在今会理黎溪,又称“小会无”其地理位置正当西夷道渡泸咽喉。其辖地为今会理南部、攀枝花仁和区金沙江以东地区和云南元谋北部相邻地区。此路溯自西昌后,沿安宁河谷南下经俭浪驿及俄准添馆驿至米易北,离开河谷东行经菁口驿而至会理,过鹿厂,经黎溪,在鱼蚌一拉蚌渡口渡泸(金沙江),翻越川滇交界的方山后进入云南永仁(汉蜻蛉县即沿大姚而辖永仁一带。在方山北麓及南坡至今尚残存有石板铺设的古马帮道。历代兵家南征多行此道。三国的诸葛亮南征、隋代的史万岁征南中、唐代南诏的北侵、元忽必烈平大理时的东路军等皆是。《读史方舆纪要·云南方舆纪要》载:“自成都经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者,古路也。”据《蛮书》所讲:此路在大姚、姚安一带分路,向西经祥云至大理与“南夷道”终点合道,接“博南道”;向东南至晋宁,此即唐代“清溪关道”的主线。

古南丝绸之路历来的全路称谓“古牦牛道”、“蜀身毒道”、“灵关道”、“西夷道”、“越嶲道”、“西洱天竺道”。除古道南路外,有北路东段(四川境内东段)称谓“五尺道”、“石门道”、“焚道”;北段西路(四川境内西段)有清溪道、会同路、姚嵩路、南路、古路、建昌路等。

上述北路东、西段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政协川西南片区文史资料协作会成员单位所在地,这些地方时至今日还遗存有关典籍、文物等可供考证的资料。现

在的攀西，古属越嶲(邛笮)。《大戴礼记·帝系》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古陵氏之女，产青阳及昌意。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后汉书·西羌传》称公：元前400多年，“秦宪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邈戎，(羌豪)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西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而被迫来西道各地，有的形成牦牛种系，后秦灭巴蜀、苴国，大批蜀人南下古道北路东西段各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指出：先秦以前，就有一条岷江、雅鲁江、大渡河、安宁河等河谷地带的自然通道。即所谓的“笮、邛、冉、駃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史载：“川滇边区，即越嶲郡一带，以若水为中心”。一可假设是当时会理迷易(今米易)。《元史·地理志》：“昔济州(今米易普威乡)，在(德昌)路西北，夷各圩甸”。“(至元)15年(公元1278年)于圩甸立定昌路，二十三年路革，改隶德昌”。杨升庵《滇程记》谓：“自邛、雅、建昌、会理、渡金沙江入姚州、白崖、白古路”。历史上古路设驿，在唐时属德昌路的诺曷(今米易)之北有标青口驿者。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年)，还设有明夷陆站(今米易攀莲镇境内)、大龙陆站(今米易坪山乡境内)等驿站。至此两广、两湖、江西等地相继沿古道移民垦殖，传入汉族文化和先进生产技能，农副产品增多。《会理州志》载：乾隆四年(1740年)迷易守御千户总常景向四川总督报告：“近来招徕厂辟人民滋生，以故事务殷繁，实与州、县无异”。由此推知：今日之米易(原迷易)，亦为丝绸南路的交通干道，或为军事冲要，或为商贸经途，抑中转西夷、中原乃至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当然，这条古路是明显的官道，史前有官方的军事征服和各地方武装的反抗，以及各地段、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械斗。因此，除汉唐鼎盛时期外，古道并不全期畅通，时断时续，唯私商沿东西主道绕各分小道、捷径，进行民间商贸活动。由于时限悠远，山川变易，沧海桑田，典籍乏处甚多，但这条古道幅员辽阔，为我们提供的思路是较广泛的，只要刻苦参阅典籍，积极发掘、发现和听取鉴赏沿途的有关文物、轶闻(古传口碑)，就会“立言”有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注：“秦献公时，北方的一支‘羌人’又复南下。绕过蜀郡，再西南下为‘徙’(天全县)‘笮都’(汉源县一带)。又南下为‘邛都’(西昌东南)”。 “越嶲羌”又名“牦牛种”，今西昌有牦牛山，其得名正因“牦牛种”南迁而得。至战国时秦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蜀。……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史记正义》注：“丹、犁‘二戎号也’，臣服于蜀。……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属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华阳国志·蜀志》记“三十年，张若因取笮

及取江南地焉”。邛笮是四川汉源至盐边带雅砻江以西山地；“江南地”即金沙江以南之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指出而西“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秦汉以前，就有一条顺岷、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等河流谷地而行的自然通道。《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广汉“南贾滇樊人獐，西近邛笮马、旄牛。巴蜀之民如临邛（今邛崃）的卓氏、程郑等“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因经商而殷富。

据考证：攀枝花市发现回龙湾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的文化特点与汉源富林文化风貌相似甚至相同。回龙洞遗址的文物与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有着某种渠道的传播关系”。其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文物分布与雅安、汉源、盐边、滇池、大理、有相似之处。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攀枝花的下湾遗址以及西昌的礼州遗址等均以夹砂陶、手制、小平底罐类器物为主。“石棺墓”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等江河流域乃至洱海地区的祥云等地都有大量的分布。

青铜及铁器时代以后的文物品类与石棺墓广泛分布在滇池、洱海、安宁河下游及三源河流域。中原地区盛行的土坟墓在四川的会理、云南晋宁的石寨山等地也广为流行。汉族移民的东汉砖室墓、崖墓等也在西南夷道沿线广为分布。“南丝古道把中原与西南夷地区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人们利用山川河谷等自然通道。川滇两省的岷江、金沙江、大渡河、安宁河、澜沧江等河谷的自然通道，进行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从广汉三星堆遗址群探知。继蚕丛先王之后，广汉就是鱼凫—杜宇王时期的都城遗址，是早期蜀国政治、经济的文化中心，并逐渐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里勤劳勇敢的人民群众，不甘把自己完全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经济文化区里，努力试图走向外部世界。由此推知：三星堆遗址存在的年代，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其下限当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由此推及南丝古道起始时间还应向前推移。再说，三星堆文物中有数千枚海贝、象牙。其中海贝经过磨制穿孔。是为货币。推知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就从南丝古道北上入境。

《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樊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险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冰又通经临邛”。早在战国时期，李冰即在川西盆地的两边大规模地开道通河。东边通至樊道（宜宾），西边通至临邛（邛崃）。至秦统一后“秦时常頔略通五尺道”。李冰所凿之棘道进一步向南延伸，南通至云南曲靖。

又溯自公元前四世纪,欧洲的雅典帝国在文学、艺术、哲学都达到世界古典的高峰,亚洲的印度诞生佛祖释迦牟尼,佛教智慧的光芒正普照大地。这是形成“蜀身毒道”以至延伸欧非的历史背景。

当时东亚华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但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国纷争频战。惟偏安成都平原的蜀国却以其繁盛的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逐渐向其所在的川西南和云南各族扩展着自己的远程贸易。沿着川西南南行的路上住着闽濮、鸠獠、驲越等少数民族(即今之藏、羌、彝、白、苗、傣、纳西、景颇等族)生息繁衍,而形成一条色彩纷呈的民族经济、文化走廊。北往国内交融,南与身毒等外国交往。当时华夏文化主要是以商品形式(特别是丝绸)作为媒介,不断传向西方。丝绸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表,成为南方丝路的桥梁。公元前四世纪到二世纪,通向中亚的河西走廊,蒙古草原都曾被羌人和匈奴人切断了,所以中国成都丝绸要转售西亚、中亚等地,必须依靠这条南丝古道。《史记·大宛列传》载:“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溯自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古希腊最繁华的时代,正是通过我国西南商贸古道,辗转运去了丝绸之类的货物,古希腊人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中国,他们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其斯即丝的谐音,就是“丝国”的意思。《纪竹行》谓:“契丹”(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即代词)人称丝为赛里克(Serek)。这显然是我国古代商人从民间开辟的西南丝绸之路把这种神奇的纺织品卖给他们时,把中国管教它“丝”的名称也教给了他们。直到现在,欧洲各国语言中的“丝”(S),大多数是从古希腊语衍生出的,直到后来我国瓷器输入南亚、西亚、欧洲之后,他们才改称这个东方古国为“瓷之国”(China)。至公元一世纪,古希腊的史学游记《厄立特利亚海周航记》谓:过何克利斯国(今缅甸庇古)抵秦尼国(中国)有大城曰秦尼(指秦汉时京都长安)。生丝、丝线及丝所织之绸缎,经陆道过拔克脱利亚(大夏,今阿富汗),而至巴利格柴(印度孟买巴罗赫港)。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道而至季米里斯,再转运欧洲。

公元前138年,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方贸易通道,即我国西北的丝绸之路。然而根据考古发现推断,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东周桓王时起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经有一些没有注入史册的商人风尘仆仆地自我国另一条更早的西南商贸古道,将我国蜀锦自川运入滇,再经南亚、西亚运至欧洲各地。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年至前187年)第一代王朝大臣考底利耶著的《政事论》载:“脂那(指蜀地)地产丝及红黑及黑白两色的织皮”。《中亚史》载:“阿富汗喀

布尔以北,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堡中有许多中国丝绸”。

美国一本学术性刊物《全国地理》杂志,于1980年3月刊登了一篇惊奇的考古报道:联邦德国一批考古学家,曾在斯图加物一个叫霍克杜夫的村子里,发掘了一座古墓,用现代技术测定,它是公元前500多年的墓葬,墓中人已化为枯骨,但骨骼上还附盖着一层纺织品残片。经考古学家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方法测析鉴定,得出一个很有价值的结论:死者覆盖的纺织品残片,竟是用中国绸制作的衣服。可以推断:中国丝织品早在北丝路开发前两个多世纪就已成为西欧日尔曼民族上层的殉葬品。

1993年4月8日《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的《埃及三千年前从中国引进丝绸一文称:“奥地利科学家发现,埃及人从中国引进并使用的丝绸的时间,要比原来估计的要早得多。奥地利科学家,最近研究一具木乃伊时,发现头发中有异物,经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异物是蚕丝纤维。这具木乃伊是三千多年前埃及第21王朝时期一名30至50岁的妇女。由此断定,当时埃及已使用丝织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丝绸奇葩竞妍。而当时繁荣的古希腊,手工业加工技术还极端原始。他们身上穿的多是羊毛和亚麻的纺织品,成衣外表粗糙,重甸、厚薄不均,且无光泽。那时,我国出产的丝绸乃是当时的“高档商品”,经过古道私商辗转贩运到西南亚、欧洲之后,更是珍贵价昂之物,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除极少的高层次贵族可以用丝绸衣着外,多数贵族望绸兴叹或只能买一小块中国丝绸用来蓬间生辉罢了。直到公元1世纪左右,我国汉代使节出访,开辟西北漠原丝绸之路后,欧亚贸易日益频繁,中国丝绸较多地占据了欧洲纺织品市场。当时古罗马逐渐兴盛起来,并取代了古希腊。许多罗马贵族女人,用质地华丽的中国丝绸,加工制缝高雅衣着。当时普林尼名著《自然史》写道:“中国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当时,普通罗马人民则把中国丝绸称之为“来自天堂的织物”。

我国蚕丝“国宝”有很强的“辐射力”。古罗马觊觎中国丝绸生产技术,试图引进和窃取生产丝绸的技术资料。但我国自先秦以前,就把丝绸当成“国宝”,对西方防范甚严。尤其西汉初年汉高祖暨后裔就意识到丝绸生产技术是我国的重要财富;及至从汉武帝起,开始制定了禁止丝绸生产技术不得外传的勒令:指出丝绸、蚕桑生产技术属于国家机密,边卡边境严查,泄露机密和违令者处斩。公元552年,东罗马帝国,趁中国南北朝对峙和彼此宫廷政变最频繁以及各地不断发生动乱的时机,派出两名“中国通”的景教教士来我国传教,不惜代价,不择手

段，搞到了蚕子和桑枝资料。藏在竹手杖里，混过边关，带回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开始养蚕缫丝，并一直垄断此专利。至 1149 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把数千名东罗马丝织工人掳到意大利南部，丝绸生产技术才传入欧洲，意大利也从此成为欧洲主要丝国。其后 200 多年，传入法国，再后 200 年传入英国，但我国一直保持丝绸优势。迄今为止，我国仍保持着世界第一丝绸生产国佼佼者的地位。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市面上销售四川出产的“邛竹蜀布”。这足以证明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四川的手工业产品就已进入了西亚市场。

蜀布与丝织品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侧重谈谈“邛竹”。《史记·西南夷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即今西昌西南及攀枝花以东北的攀西地区）”。《图经》谓：“漫曰邛民，毛曰邛竹矣”，《正义》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左太冲所著《蜀都赋》称“邛杖”（邛州出产的竹杖）。这些邛竹杖远销身毒（印度）、大夏、掸国（缅甸）、以至大秦（罗马）的欧洲国家，也是作为一种“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的传播（任乃强著《四川上古史新探》）”

崇拜竹系云、贵、川等地羌、彝民族图腾崇拜的遗迹，传说古代有夷青年，见上流洪水冲来几节竹子，剖竹得 5 子，及长以编竹为业，乃青彝之祖。相传古道南路（即滇缅段）过去有朝“竹郎庙”、“竹王庙”和祭兰竹以及妇女不孕，求祭山竹之司。

《夷裔考》等史书指出：西羌人作为滇支民族的邛笮人，植笮人（一种带刺的竹）作防卫用。棘人组合为笮，是表明该民族以竹为族称，是他们对竹作为图腾的反映。《四川中古史新探》谓：金沙江以南的夷人（夜郎为元谋人后裔），在汉以前为“夜郎竹文化所被”。亘古以来，邛崃（攀西）地区，一直有崇拜竹的传说，这些地区供奉祖先灵位的竹品叫“玛堵”，玛堵的玛为竹之意，堵为源之意。意思是祖先从竹来，祖先的灵魂归竹去。“玛堵”是用 5 寸长的木棍一根，剖成两片，中间凿个小孔，叫做“灵屋”，然后毕摩（祭司）将烧尸坟上的一小节竹根截成片，用棉线把逢三月时剪下的羊毛与竹片系在一起，表示祖宗灵魂所在，置于灵屋内供奉。这灵屋与竹片制成的灵魂彝族人民就叫它为“玛堵”。

驰誉中外的滇中古刹云南昆明市西北郊的玉案山巅的筇竹寺，是中原佛教禅宗传入云南的第一寺。前人曾题有：“玉案晴岚”的巨幅匾额。明代日本僧人机光曾诗赞曰：“山如玉案自为名，卓立天然刻画成。白昼浮岚浓且淡，高秋叠翠

雨还晴。阴连太华千寻秀，影浸滇池万顷清。杖策何岁凌绝顶，滇南一览掌中平”。这里的确是古道逶迤，泉石罗列，崖涧婉转，湍溪争琮，岚翠四合，气宇轩昂，景色清雅，美不胜收。据考证：地产灵山白象呈祥青狮献瑞；天开胜地犀牛表异筇竹传奇。世本无筇字，何谓筇竹？此地本无一株筇竹，其寺何以得名？《说文外编》及《正义》均称：“无筇字”“筇竹”本作“邛竹”（罗汉竹）。《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西南夷传》和左思的《蜀都赋》以及《正义》等史书称：“竊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邛都的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笋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那时邛都、邛山，邛竹一度属云南南诏国。史载：“唐之祸起于南诏”，宋太祖赵匡胤明确表示：以大渡河为界的越嶲诸郡“非吾有也”，由此可知：张竊在大夏所见之邛竹，乃邛崃（今攀西）之竹。

相传在唐朝贞观年间，大理国的都阇侯（都闾侯）高光、高智兄弟到西山畋猎，忽见林中一只犀牛出现，两兄弟就急起直追，当追到玉案山沟壑时，犀牛不见了，却隐约见到密林处群僧人，又如仙似鹤，高氏兄弟又攀登到达那里，已不见奇异的僧踪，却见异僧所拄的几根邛竹拐杖还插在地里拔不出来，忽而生笋发竹，形成一片湖碧景象，高氏兄弟认定是佛爷显圣，以虔诚的敬意，集资修建了这座梵宇。又传这座邛竹寺系元初高僧雄辨创建，该寺于明永乐17年（公元1419年）被大火烧掉，至永乐20年至宣德2年重修，至清又两次修葺。现在的邛竹寺实际是清光绪年间修成。

《司马相如列传》里的蒲、苳、濮为别写，均为元谋人后裔滇支民族邛笮一古百濮人。金沙江、雅砻江和安宁河干热河谷地带的摆夷（又称白夷或土里，由白濮人演变而来），粗耕农业兼牧业。史载在南方丝路上有摆夷儿童（也称“樊童”）作为奴隶转贩内地，无疑成为古道见证之人。《蜀志》“笮夷也”。史志位于沈黎郡（今汉源）之东南，金沙、雅砻两江之西北。而大笮、定笮多是今之攀西“两盐”（盐边、盐源）区域。《史记》谓：巴蜀因“取笮马樊童牦牛”而“殷富”，《后汉书·安帝本纪》载：“永初6年（公元112年）置长利、高望、始昌（其中就有今日盐边）三苑养马……”，相传笮马（今之云南马、建昌马）一直是唐之后朝廷征购的军马。考古学家在攀西裂谷先后掘出属于笮马的古三趾马、属马化石。此马日行数百数，还善于登高山，行狭路，上陡坡，走羊肠小道。驮物行程可持续20余天，此马曾从古道转销内地，还曾肩负了欧亚经济、文化交流，为古道增辉。古道形成因素甚多，考证拾零繁冗，仅供参考。

我们学历史时，早知张竊开辟北方丝路之后，是沟通欧亚的重要孔道，但路

驼运丝绸之类的货物,在大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和崇山峻岭之中跋涉,要受到劫持和天灾,要受到匈奴胡骑的袭击。尤其丝物运销欧洲时,必受伊朗(古称安息、西称波斯)等国关卡盘剥,因此自古以来更早的南丝路绝非坦途。

《史记·大宛传》载:张骞出使西域时,获知在约两个世纪之前,中国西南有一条民间通商道路大夏距汉地一万二千里,在汉西南,印度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那里的产品运输距离四川必不远。他向汉武帝上疏开发此道,汉武帝诏敕他由四川犍为派出使者南下,从驢、冉、徙、邛笮分四路进发,然其四路使者受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汉使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四道并出,出驢尾、出冉、出邛笮,皆各行一二千里。”然而汉王朝派遣的使臣受到氐、僰、邛、昆明、且兰等部落民族的阻拦、骚扰,他们“辄杀略汉使”、“夺币财”,人杰地灵,物阜天宝。西汉长安八万零四百户时,成都就有七万六千一百户。成都与西南古道各地过从甚密。秦时云南不设郡,而蜀郡当时包括一部份今日云南方舆。《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着川滇当地财货繁荣的情况。当时山东移居来的程氏富比王侯和临邛卓氏等于古道专事商贾,进而将天府商品(盐、铁、布帛和手工业品等)远销印度、中亚等地。而西南当地部族群落为了掠夺和垄断获利巨大的过境商贸。因而对汉族南行作梗。他们不要官方使者插手,以便征收买路钱,或者直接参与走私贸易,从而获捞巨额利润。古道受阻的另一原因是:蜀道难艰,耗资甚巨,费工极多,民怨犹深。

《史记·古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食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蒙乃上书曰:‘……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于是“令蜀通犍道、青衣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初,乃“犍道令通之,费功无成,百姓愁怨……使者唐蒙南入,执令将斩之……蒙乃斩石通犍道”。唐蒙以巴蜀为基地“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华阳国志·蜀志》)“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二、三丈。其凿之迹犹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南夷道”耗资甚巨,伤亡太大,并用汉“军法”惩罚不服及不力的头人,引起“巴蜀民大惊恐”及一些大臣的反对。“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水经注·江水条》载:司马相如前往察后对唐蒙开南夷道的“蜀中长老”及朝廷大臣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司马相如对于开南夷道,“请以身先

之”。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迹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两至沫、若水，南至牂牁，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史记》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首，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淮书》载：“当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笮以集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偿之。”表明这种举措，人民承受势感负重。因有“戍转相饷，士罢饥离，死者甚众。”加之当时外有北方匈奴威胁，南部的“西南夷又叛反”；而内又有以御史大夫公孙弘等为首的“罢西南夷派”的反对，汉武帝为集中力量解决北方的匈奴这一首要矛盾，遂于元朔三年“罢西南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然自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向汉武帝陈述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的事引起了汉武帝的再次关注。“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武帝记》谓：汉武帝意识到开“西南夷道”不仅可在西南夷设郡置吏，并可进而成为一条国际通道。于是“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住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支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汉武帝诏敕使者分四路南下，然每进一、二十里即受阻。元狩到元封的公元前122年至105年间，张骞多次举兵南下扫除路障。其中尤以元封2年（公元前109年），派遣郭昌、卫广两将军率领巴蜀士兵和三辅罪人数万，征讨曾经杀害和阻挠汉使南下的西南夷首，这样才能把四川丝绸等物资南运。

《华阳国志》载：“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万人”，大获全胜。设置了越巂、牂牁、沈黎、文山、武都等郡。由此使西南夷道通至滇西洱海地区。《南中志》载：“孝武帝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渚溪，置巂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从而开通‘博南道’。《西南夷传》指出：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俾建永昌，同编亿兆。”“故关守永昌，肇自远裔，启立土人，至今成都焉。”至此博南道、西夷道、南夷道三道连一通“南路”。沿线设置邮亭、驿站和“移民实边”、“屯田”，且“募豪民田南夷”，“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旨在加强西南夷边区西道建设。此后，据《史记》等史载：“然闻其（邛、笮、昆明），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国（考证为加摩婆波，古名Danava的译音，今印度阿萨姆）。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其毗连的云南，在西汉时，朝廷兵力已达到云南东部，夜郎、滇国等都先后归附汉朝，因以设益州郡。